

文章检索

特别专题

组织机构

专家库

您的位置: [首页](#) >> [论文库](#) >> [青年恋爱、婚姻与家庭研究](#)

澳门青年参政意识的历史发展及现实启示

吴军民 | 最后更新: 2004-5-17

澳门青年参政意识的历史发展 及现实启示

吴军民

澳门是一个年轻化的社会。据1991年人口普查, 35.55万常住人口中, 30岁以下的占51.5%。青年在澳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澳门青年参政的历史回顾, 探讨回归后青年参政意识及其挑战。

澳门是多元文化影响下的“移民社会”。自16世纪中叶葡人东踞澳门后, 四百多年来这里成为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交汇、碰撞的前沿。葡萄牙文化、西方天主教、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都对澳门产生过影响。1991年人口普查显示, 澳门常住居民中97%是华人, 2%是土生葡人, 1%是葡籍人士。相应地形成了三种社会政治文化圈: 土生葡人, 对澳门有强烈的归属感, 他们不易融入外来葡人的圈子, 但却很少与本地华人来往; 澳门华人, 大多由大陆迁来, 对大陆政治文化较为认可。这两部分人对葡萄牙没有归属感。葡籍人士, 主要来自葡国公民, 作为政府在澳门的主要代理人, 掌握了澳门的行政立法大权, 主导着澳门的政治权力中枢。这种特殊的社会构成并没有造就一种截然对立的的文化形态, 相反, 在相当长时期里主导民间政治价值取向的不是葡澳当局的官方文化, 而是大陆的政治格局与传统, 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而又互相渗透的澳门水土文化。众所周知, 与香港不同的是澳门主权从未割让给葡萄牙, 大众政治文化很少受葡人文化的控制。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历代中国政府。所以澳人认同中国文化, 为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深感骄傲。

受着独特社会政治文化圈的影响, 澳门历史深深地烙上了“自治”的印记。1583年澳门自治组织—

一议事会成立。葡萄牙人依照本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内部自治，维护葡人社群利益。与此同时，又遵守中国的法律，对广东地方当局恭顺臣服，实行双重效忠。而明清政府也一直保持主权以及对居澳华人管理的权力，直至1849年澳门总督亚马留将清政府驻澳官员驱逐出澳后，才打破了两百多年华洋共处分治格局。但习惯了议事会管理模式的澳门居民包括居澳华人在内，并不支持亚马留的殖民行动，从而部分地导致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长时间不甚明朗。尽管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承认了葡国“永居管理澳门”的权利，且1928年《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又缓解了粤澳划界矛盾与纠纷，但它们均不同程度地回避了澳门主权问题，这大大影响了葡人统治澳门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华人也一如既往，继续生活在葡萄牙人法制之外。

上述澳门政治和历史文化特点，是我们研究澳门青年政治文化时不能忽视的。

二

20世纪以来，澳门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共处分治，以葡人管治为主时期；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初至80年代，为逐步独立于葡国之外的华洋各自为政自行其是时期；第三阶段，80年代末以来，为加速本地化进程向澳人治澳转变的过渡时期。由此，这一独特的政治历史环境所孕育的青年现代民主思想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点。该认识笔者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参政意识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碰撞

这里的“参政”主要是指华人青年参与葡澳当局对全社会进行管理。青年对自治社群圈内事务的参与与早已有之，在此不作赘述。如前所述，由于澳门政治法律地位一直悬而未决，中葡两国均未能在澳门充分行使权力。为便于管理，葡萄牙当局在1909年出台了一项《华人风俗习惯法典》，对澳门华人的传统做出某些照顾，但原则和法律上，葡萄牙对所有居澳人一视同仁。华人传统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并确认了华人在澳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尽管他们仍生活在殖民体制之外，没能进入政府主导层，但为社会敏感性最强的群体——青年走上政治舞台，施展才华，带来些许希望。

受传统影响，澳门青年对华洋共处分治较为认同，华人社群自治是他们所乐意维护的管理形式。这种状况是澳门历史的必然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并不具备现代政治管理的功能，其核心价值观不利于现代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极易走向极端——无政府主义。而澳门的历史又为这种极端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澳门现行行政体制是根据1933年葡萄牙的宪法性文件《殖民条例》而设立的。该文件单方面地把澳门列为葡国的海外殖民地，规定了澳门殖民公务员体制，葡人掌管了澳门的行政立法大权，几乎所有公职均成为葡人专利。由此在华人中造成这样一种心态：一方面是无奈地居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另一方面是对殖民运动的抵制。1966年“一二·三”事件，使葡人管治澳门的基础和权威严重受挫，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在独裁与无政府两种极端社会政治现实的冲击下，澳门青年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甘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还是维持共处分治的现状？抑或是担起一个大责任，实现澳门回归，祖国统一？回归祖国，实现统一是全体华人的共同心愿，青年责无旁贷。对这一历史使命的认识与

认同，表明澳门青年已开始反诸其身，认识到自身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欠缺。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革故鼎新创造了思想条件。

（二）社群分治的历史与民主的统一要求的融合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澳门青年冷漠政治、参政意识淡薄，是由于政治体制长期将华人排斥在外，青年失去参政权利的话，那么进入70年代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974年4月，葡萄牙发生了民主革命，推翻独裁政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在遵守该章程及葡国法律条件下，澳门享有行政、财政及立法自治权。除澳督咨委会以间选形式开放席位为社会团体外，澳门首届带有较浓民主色彩的立法会17位议员中，有6位直选产生，5位通过间选产生，5位由澳督委任。政治环境的宽松与改善，吸引了部分澳门青年精英参加到澳门政治生活中。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标志着澳门进入过渡时期。处于过渡时期的青年摆脱了游移不定的观望心态，这一点与过渡时期香港青年有很大不同。澳门青年深深认同大陆文化，对葡澳政府历来缺乏归属感，甚至可以说澳门本地青年比新移民更爱国。但是，随着回归日期的迫近，传统社群分治的惯性思维给青年参政带来的影响具有双刃性，由此这一时期的青年参政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自主自决意识

它与澳门华洋共处分治的历史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由于政权因素对华人社群圈内事务影响较少，凡事多在圈内依靠传统习惯解决，但若是视野只局限于此，对社会其他事务不甚关心，那并不是好事。事实也正如此，由于澳门青年没受到过类似大陆“文革”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们能够比较平静地对待中西文化，形成近乎独立的政治个性，对政治运动表现出鲜有的冷静。这既是他们的优点，也是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2、协作、参与和政治责任感

在澳门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受西方现代民主意识与思想影响，注重社会参与和协作，力图增强对澳门诸多生活领域的影响。他们并不满足于上代人几十年的惨淡经营，而是希图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于文官制度化、行政现代化和公务员本地化工作开始缓慢启动，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为青年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进入政治上层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传统分治思想的负面影响，青年在团队协作和法律观念上尚须加强，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民主生活的要求。

3、国家意识

澳门居民具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国家意识鲜明而深刻，《联合声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升华了居澳华人这一强烈而执着的情感，并在宪法性法律文化上加以确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联合声明》与《基本法》构成了澳门青年国家意识的核心内容。同时，这也表明澳门青年在回归后应将这一意识化为实实在在的统一国家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坚持“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政治制度。

（三）政治倾向明朗化和民主价值观成熟的呼应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澳门青年政治文化呈现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青年组织、社团的成立及其活动方面。据统计，澳门目前有40多个在青年厅注册的青年组织。这些青年社团大多是志同道合的各界青年及在校学生自愿集社而成，他们均有明确的章程、宗旨，并以各种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赢得了青年们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他们全方位多角度地发挥着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如“澳门青年商会总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等，有力地提高了青年主体意识水平，增强了统一国家意识，促进了健康社会观、民主观的形成。

政治倾向性的增强，伴随着民主（政治）价值评价的成长与成熟。澳门大学余振教授曾做过一次调查：发现青年对葡澳政府的信任度不到38%，对澳门的政治和司法制度感到骄傲的，分别是43%和35%。青年对澳门政治体制的认同感普遍偏低，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澳门现行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满，与潜力优厚的香港比，多了份自卑与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希望变革现存政制，公平竞争，加快本地化进程，充分发挥“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优势，创建一个繁荣、稳定、健康的新澳门。另外，也应注意政治倾向性的强化具有双重性。对民主的忠诚情感不能替代对民主的理性判断，对政治系统的情感承诺过于强烈，会给民主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适当地对青年政治倾向加以引导和矫正，培养他们树立合乎国情的民主价值观，将是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三

当代澳门青年正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跨国传媒的推波助澜、促进了西方现代民主价值观在全球的传播，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目标的形成。科伦坡大学社会学教授S.T.赫蒂盖认为，全球力量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跨国界渗透会给亚洲社会生活，特别是青年，在国家观、生活方式、青年作用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前沿的澳门，回归后在青年社会参与方面将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人才培养与信心重建

近年来，澳门政府和私营机构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在中小学校师资培训上下了不少工夫。当局于1989年开始推行教育改革，《澳门教育纲要法》也在1991年颁布生效。在青年教育方面，政府一方面通过收购东亚大学创设澳门大学，初步建立起澳门高等教育体系，加速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大量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采取“赴葡就读”“赴京就读”等一系列措施，鼓励本地青年赴外地深造，教育面貌有了显著改观。但是由于澳门教育强调应用型、复合型、交叉型人才培养，推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忽视对青年进行心理建设和信心教育，从而导致了青年在信心、心理上的两个怪圈，外来青年对澳门社会的认同以职业或生存认同为主，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自身职业技能基础之上；而本地青年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与港台青年相比，则有着一一种“底气不足”的反应。因此，在未来澳门青年人才培养中，培养青年树立自信、自尊、自强意识，加强青年心理建设，当是应有之义。

（二）身份认同危机与归属感

青年对葡澳政制的低度认同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缺乏澳门本土自豪感。这一结果值得深思。尽管我们可以从澳门人口构成（一半以上人口为大陆移民且一半人口居住不足15年）和教育（缺乏公民教育与澳门历史、地理此类本土文化课程）上找原因，但问题的关键则在发挥青年社团作用，加强沟通，引导青年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效益事业，协助他们对社会有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三）经济发展与政治意识

受益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澳门经济随波逐流地发展起来。“先天不足”（地域狭小、资源贫乏）和“后天失调”（知识技术薄弱与基础设施不足）是这一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反映在青年社会意识上很可能是两种极端：愤世嫉俗或政治冷漠。两者中任何一种倾向，对未来青年民主思想的健康发展都可能是灾难性的。这不仅因为青年是澳门社会的主体，更出于这两种极端思想会给创建一个民主、高效、廉洁、开放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带来莫大困难。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引导青年树立“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主流意识，是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又一项重要工作。

（四）参政水平、能力与政治热情

随着回归，澳门各种社会力量重新整和，各种集团纷纷崛起问政，力图在未来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可喜的现象，反映了澳门人民参政意识水平的提高，但也应看到，这些集团能否顺应形势、代表民意尚需实践检验。未来澳门行政需要一大批思想独立开放、有爱国心、守法、训练有素且谙行政运作的青年。因此，为承担这一使命，青年既要有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水平的参政议政知识与能力，又要目光长远敏锐，视野开阔，理性地应对形式的变化，展示澳门青年新形象。

参考文献

- 1、吴志良，《港澳政制比较：澳门的挑战》，《中国评论》，1998年4月号
- 2、李雁玲，《澳门公务员制度的演变与现状》，《港澳经济》（广州），1994年第10期
- 3、[斯里兰卡] S. T. 赫蒂盖，《亚洲青年在21世纪的机会和挑战》，《当代青年研究》，1991年第1期
- 4、梁英，《澳门未来发展与人才需求》，《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1999年第6期）

吴军民：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

责任编辑：木新月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